

#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1820)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美]白彬菊 (Beatrice S. Bartlett) / 著  
董建中 / 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君主与大臣： 清中期的军机处 (1723—1820)

---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

[美]白彬菊 (Beatrice S. Bartlett) / 著  
董建中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美）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著；董建中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24007-7

I. ①君… II. ①白…②董… III. ①军机处-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1489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美] 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著  
董建中 译

Junzhu yu Dachen: Qingzhongqi de Junjichu (1723—1820)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5.12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1 000	定 价	6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作者简介

白彬菊 (Beatrice S. Bartlett)，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入耶鲁大学学习，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发表多篇有关清朝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价值的论文。1991年，《*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一书出版。目前正在撰写关于清朝档案历史的著作。

##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合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组织翻译《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专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戴逸

执行主任：马大正 崔建飞

委员：卜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赫晓琳 李岚

#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atrice S. Bartlet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and 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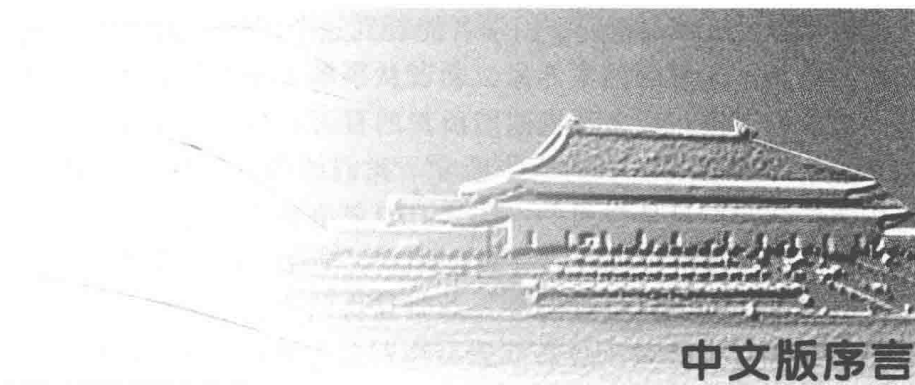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英文本出版于 1991 年。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很高兴看到许多著述仍在引用它。更令我兴奋的是，它的中文译本将要面世，我要感谢译者付出的辛劳，更期盼着能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对本书的意见。

我参加耶鲁大学博士生口试的时候，中国 18 世纪历史的所有英文研究著作只有六种，且所有作者都没有机会参考原始档案，只是利用了少量已出版的档案。我的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后因有了无比宝贵的机会，阅读到保存很好的清代档案才最后定型：开始是 1970 年代在台北（当时美国人不能到北京进行研究），接着是 1980—1981 年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我及其他的美国人到中国大陆。1985 年再次来北京查看了一些新近开放的满文档案。在两地，我与许多学者交流，获益良多：台北，有庄吉发、赵中孚、张伟仁；北京，有韦庆远、单士魁、鞠德源。这六位先生只是与我疑义相析、成果分享的主要朋友，还有许多朋友恕不能一一列名。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同行致敬，他们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外国





人做出了重大贡献；想到中国学者能看到这个序言，我特别高兴。最重要的是，大量的档案专家、学者从事繁重的整理、编目、出版、缩微等工作，近来又将他们负责的百万计的文件数字化，以便于检索；如果接触不到这些珍宝，我们的研究定然困难重重。我们要感激的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如果清朝内阁与军机处的学者—官员们认识不到需要有完备的档案，或是没有创造出完善的分类与保存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将何去何从？清朝覆亡后有人想毁掉这些档案，如果不是一些人奋力抢救，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又将何去何从？我们要感谢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过去的与现在的。我在注释中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毫无疑问，它们是我研究的立足之本。西方许多学者的研究亦复如是。

能与现当代中国学者交流，阅读中文著述，这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身为西方学者，我们受惠于有着先行研究的许多中国学者。18世纪的数位士大夫以及近人已写有军机处的历史，值得称道。我开始研究军机处时，首先做的是文献回顾。后来，在台北和北京长期停留期间，我有幸与当地的学者讨论。有机会在中国人的圈子中生活，对于我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教学都至关重要。最终我认识到，军机处的建立与发展是清史的一大关节。我在台北的老师赵中孚一再强调，皇帝崇信分而治之的做法，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成功的一大法宝。庄吉发先生与我分享了他深邃的见解：雍正皇帝操控着一个非正式的内廷，在内廷，皇帝的大量谕令不会自动转化为法律。此外，军机处的发展代表了历史悠久的外朝（这一时期由内阁和六部主导）与内廷（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极力发展的高层心腹和小规模机构）间竞争的新阶段，这一见识是我研读傅宗懋、钱穆、吴秀良著作的心得。这些想法的灵感不是来自西方学者，而是来自中国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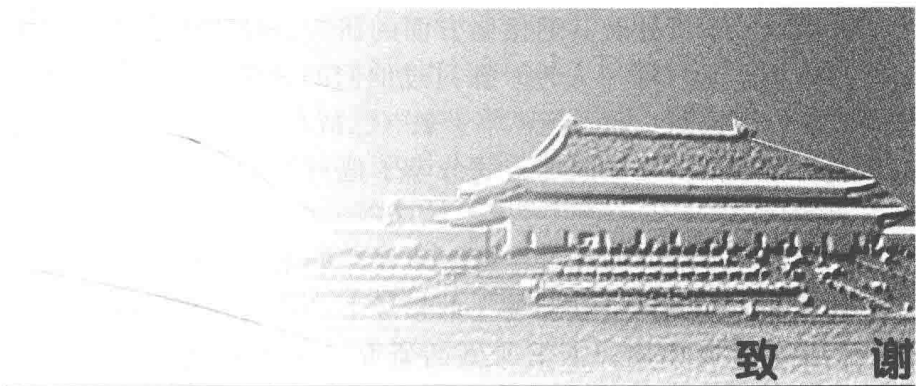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有书评批评我没有使用西方学者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国家建构等理论。事实上我了解蒂利的想法，但认为不如中国学者的想法更贴近我的研究。遗憾的是，美国或欧洲的书评者们没有评论我使用的内外朝斗争的分析方法，而我发现，这对于理解我的研究至关重要。

最后要说的是，通过挖掘档案，我对清中期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1）军机处的设立（因为档案所揭示的与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2）对军机处的业务流程的新的描述，以及对18世纪军机处的发展原因的新解释；（3）朝廷决策上的根本性改变，这也带来了皇帝权力行使上的变化。18世纪盛清——清朝发展的顶点——的大批档案，是理解这些过程的钥匙。我认为，18世纪中叶，中央政府运行方式有着方向性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创立了一个新的使中央政府强大的内廷组织，对于其后清朝的历史进程影响至深。在我的研究中，台北和北京的档案不可或缺，两者有时互相补充。

我的书并没有提供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进一步的研究会找到新的材料，并会有新的解释。我期待着看到中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白彬菊 (Beatrice S. Bartlett)

2013年4月于纽黑文



## 致 谢

很高兴能向这些年来在各方面支持我事业的同事、朋友、家人表示感谢。在耶鲁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并决定要研究嘉庆朝(1796—1820)历史后，我向数位学者请教，对于这一朝，什么事是他们最想知道的。有些回答关切的是这时的皇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些谈话之后，我的研究远离了此题，而且，身为历史研究者也促使我的研究要回溯到嘉庆朝以前，我的一个发现是，军机处的兴起可能确实影响着皇权。

在清史知识上给予我帮助的良好师友，还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中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庄吉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韦庆远。毋庸置疑，没有这些同事和朋友，我的工作早就半途而废了。

关于军机处的头一百年，已有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其中一些已经出版，将来会出现更多。军机处自身的大量文献是我研究的基础。理解清朝各种通信的往来与变化，对于利用这些文件并理解内廷通信体系在军机处兴起并居主导地位问题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下面要感谢的多是在此问题及相关辅助研究上给我帮助的人。





此前对于军机处及其通信诸方面的研究，价值无法估量。我有幸与以下学者（除一人外）探讨过他们的著作：庄吉发，傅宗懋，黄培，鞠德源，刘子扬，单士魁（已故），吴秀良。我在台北的最初几年，吴教授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对于清代文献的渊博知识，对我帮助尤巨。

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博士，他在清代档案利用上给予我特别照顾。在蒋博士的领导下，该院开放所藏重要的清代档案供学者使用，本书所做的研究才成为可能。我在台北“故宫”做研究时极为愉快，结识了许多朋友。难以开列所有我应感谢的人，但还是要特别提及以下几位：张临生，昌彼得，陈启福，陈捷先，冯明珠，侯俊德，赖永貳，李如珍，那志良，索玉明，苏笃仁，唐裕瑞，王景鸿，吴哲夫，吴玉璋（已故）。当时一些身在台湾的人也给予我帮助，包括：Jerome Cavanaugh，张伟仁，胡映芬，Robert Irick，李光涛，Jean Oi，P'eng Hung Hsiao-ju，Robert Weiss，Yang Shuo-hsiang，尹志文，尹王锦。

在北京，我得到了以下诸位的帮助：韩毓虎，黄啸曾，江桥，鞠德源，林永匡，刘桂林，刘忠英，王澈，吴体乾，延永生，杨乃济。我尤其感谢韦庆远教授，1981年3月他两次安排我与单氏兄弟（已故的单士魁、单士元）面谈。我也感谢中国国家档案局的邀请，使我能作为政府客人出席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明清学术研讨会。有幸的是，通过那次访问，我进一步查阅新近整理的满汉文档案资料，而这是以前无法看到的，这些资料对于本书极为重要。

在日本，我得到了 Michael and Carol Freeman，宫崎市定，Ishikure Kyoko，Robert Somers（已故）的帮助。在香港地区，我在与香港博物馆登记员 Robert Lam 的联系中得到有用信息，吕元骢为我安排查阅了廖日荣的论文，还要感谢容启东、容何露珍（已故）。

在美国和海外给予我帮助的学者，包括：A. Doak Barnett，Knight Biggerstaff，陈弱水，陈国栋，Janis Cochran，James Cole，

Pamela Crossley, Natalie Zemon Davis, Jack Dull, Ulla Dydo, Robert Entenmann, John King Fairbank, Edward L. Farmer, Joseph F. Fletcher (已故), Charlotte Furth, Bob Geyer, L. Carrington Goodrich (已故), R. Kent Guy, Lotte Hamburger, Michael Ipson, Robert Jenks, Rick Johnston, Hideo Kaneko, Robert Kapp, Philip A. Kuhn, Hong Yung Lee, Ruth Barcan Marcus, Tony Marr, Alynn Nathanson, Don C. Price, William and Priscilla Rope, William T. Rowe, Benjamin I. Schwartz, Stephen Shutt, Kent C. Smith, Hugh Stimson, Leonard Thompson, David Ts'ai, 杜维运, Frederic Wakeman, Joanna Waley-Cohen, 王国斌, Edmund Worthy, Arthur and Mary Wright (已故), 吴展良, 余英时与陈淑平夫妇。在此特别要提到 Susan Naquin 教授, 我分享了她大量阅读与广泛浏览清朝档案的信息和经验。我也感谢 Joseph F. Fletcher 教授接纳我作为 1981 年哈佛大学他最初开设的满语班的一员。我对满文的识读, 在解决关于军机处发展的一些问题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xiii

阅读本书的书稿需要非凡耐心, 很幸运有许多评议者审读了不同的章节, 我对他们的评说、质疑、争论表示感谢。感谢 Thomas C. Bartlett, Marie Borroff, Sherman Cochran, Joseph Hamburger, Emily Honig, Howard Lamar, Kenneth Lieberthal, Ann Lindbeck, Dian Murray, Elizabeth J. Perry, John Shepherd, Jonathan Spence, Lynn Struve, 魏白蒂, Margaret Wimsatt。书稿的一部分曾提交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研讨班 (Modern China Seminar), 我要感谢 Madeleine Zelin 对此的安排, 并特别感谢我以前的老师 C. Martin Wilbur 教授的深入评析。书稿的一部分也曾提交新英格兰历史学会, Michi Aoki 和 Terry MacDougall 都给予了有益的批评。我曾提交亚洲研究协会新英格兰分会年会一篇文章, 得益于余英时的评述; 我 1988 年春天在塞布鲁克学院做报告, 从该学院我的同事那里获得教益。当然, 所有这些人无须为书中的错误负责。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对我的帮助极大。我最初与负责人

James Clark 的联系后来被证明是明智之举。我从两位审读者——Jerry Dennerline 和 Madeleine Zelin——的评论中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书的编辑 Betsey Scheiner 始终支持我，我也特别幸运遇到文字编辑 Anne G. Canright。各阶段文稿录入，我要感谢 Janis Cochran, Katy Greenebaum, Ginny Guin, Joan Hill, Stephen Shutt, Florence Thomas, Karin Weng, Gretta Yao。

xiv 我要感谢以下清代档案的收藏单位：在台湾地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明清史料）和近代史研究所，当然，首先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那里有细致分类和著录的档案。在中国大陆，我主要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极好馆藏，还有机会查阅了位于沈阳的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在那里得到了沈微、吴福恒的帮助），也有其价值。在伦敦，我查阅大英图书馆的资料和京报，要感谢负责人 Howard Nelson。我利用的图书馆主要有：大英图书馆、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

本研究有经费上的支持，许多年前就得到了布里尔利学校的特别教员资助，这是全国性的国防外语奖项。最初前往台湾，得到了富布莱特—海斯经费资助。在台湾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如下支持：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资助的是另一个但与此有关的课题），嘉兴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以及亚洲研究协会内亚委员会（也是资助另一个课题）的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支持我在北京查阅档案，当时这些档案已经整理并向外国人开放。1985 年我应中国国家档案局邀请，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和耶鲁大学惠特尼·格列斯伍德师资基金的赞助，能够短期回到北京。本书的撰写部分得到了耶鲁大学国家和区域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还未着手本书的写作，但仍然要感谢费正清中心所提供的学者间交流，并使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准备本研究工作。

最后，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家庭对于知识的渴求之情并不逊色于中国的家庭，我能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激是高兴且温馨的